

欧盟危机与呼声党的崛起

郭雨凡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市, 102249; 18810173909@163.com)

摘要: 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VOX)的崛起是欧洲一体化矛盾与西班牙国内社会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超国家行为体与民族国家互动的视角出发, 分析欧盟治理危机(如债务危机、难民问题)如何通过“非政治化”决策激化西班牙社会的保守主义回潮, 进而推动呼声党以民族主义、疑欧主义和传统价值观为纲领实现政治突破。研究发现, 呼声党的成功得益于其对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焦虑、移民文化冲突及欧盟民主赤字等议题的民粹主义动员, 其本质是西班牙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身份认同与主权危机的应激反应, 而非简单的弗朗哥主义复兴。这一案例揭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民众间的代表性断裂, 为理解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蔓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呼声党; 民族主义; 欧盟危机; 保守主义

引言

西班牙呼声党(VOX)的崛起被视为该国政治碎片化的象征, 原本两大传统政党主导的政局被打破, 政治极端化初现端倪。呼声党由中右翼政党人民党分裂而来, 它的诞生契机源于部分政客对原政党内部的腐败丑闻, 以及对于人民党首相面对分离主义者时展现出软弱性的不满, 它被称为弗朗哥时期留下的阴影, 代表着西班牙社会的传统保守右翼势力——包括民族主义、天主教传统和法西斯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 呼声党的政治主张也被视为具有疑欧主义特征, 呼声党的领导者阿巴斯卡尔(Abasca)曾在其书中明确提出要求制定新的欧洲条约、削减欧盟预算、并退出违背西班牙利益的超国家结构。该党承诺, 一旦进入欧洲议会, 将捍卫西班牙在欧洲的利益[1]。

呼声党于2014年进入公众视野, 最初却并未得到太多关注。该党的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 呼声党在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大本营的安达卢西亚的议会选举中成功赢得了11%的选票, 并选出了12名议员。2019年11月, 在西班牙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15.1%的选票, 在2023年的选举中, 它的得票率虽有下滑, 但依然保持在12%。

学界对呼声党崛起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视角: 第一, 呼声党的崛起源于难民危机与加泰罗尼亚冲突。邓曙和尹建龙在其研究中解释道, 呼声党通过反对分离主义、支持削减欧盟支出、支持经济自由化、维护传统天主教信仰和西班牙生活习惯来获得选民支持[2]。第二, 在宣扬右翼意识形态的基础上, 呼声党还采取了特殊的崛起路径, 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党派的道路。学者卡拉曼认为, 呼声党进入政治空间的方式不是抛出一个政治问题或是代表某个具体的阶级, 而是提供一系列广泛的话题, 其中一些话题通常是“禁忌的”, 它涉及国家、民族身份、国家主权、女权移民、历史记忆等的广泛议题[3]。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民粹主义特征, 它利用了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特性, 突破了传统政党的信息封锁, 使得领导者得以与选民建立直接的情感链接。第三,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 呼声党的崛起源于对大众对人民党的不满。米盖尔认为, 西班牙极右翼在民主化后的缺席掩盖了新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持续存在, 这种取向被稀释在亲民的人民党内部。但随着Vox进入安达卢西亚议会, 极右翼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成为反全球化思潮的领导者 and 威权主义的支持者, 与失去独立表达渠道的法西斯主义社会思潮建立了明确联系[4]。

总的来说, 呼声党的崛起与西班牙社会危机、政党代表性危机与后现代社会变革有关, 但目前的解释结构仍偏碎片化, 缺乏一个将所有因素系统化的叙述逻辑, 为何保守主义思潮会在欧洲一体化日渐加深的情形下再度引起西班牙人的欢迎? 这种右翼思潮究竟是弗朗哥主义的回归, 还是某种新的思潮? 欧盟作为超国家行为体, 深切影响着其成员国内部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势必要将政党的发展置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而不能只将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本文将通过解析当下欧盟危机与成员国内部矛盾的传导逻辑, 将呼声党的崛起过程放在欧洲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研究, 以此来解释超国家行为体的变革如何影响政党的发展, 政党又如何对其进行能动的反映。

1. 一体化危机与疑欧主义

根据卢克·冯·米德拉尔（Luuk van Middelaar）在其书《喧闹与忙乱》（*Alarums and Excursions*）中的解释，欧洲一体化的体制建设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两种定位中徘徊，其一是作为维系和平的制度，它的产生来源于两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德国霸权的警惕，和对欧陆和平的渴望。他们寄希望于构建起一个统一的市场，以此消弭了国家之间的边界，确立一个共同的发展方向；其二是人们期望欧盟可以作为一个可以行使权力的政治机构的存在，它来源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求，目的是构建一个可以统一调度资源的共同体，配备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能力和行政机构，能够及时向民众解释自身的决策对民众负责 [5]。

欧盟创始国的目标都是通过更紧密的合作，为欧洲人民带来更多繁荣和安全，但在实践过程中，他们从未就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达成一致，而是涌现出三种路径，分别是非政治化、议会化和首脑化。

非政治化源于二战后重整四分五裂欧洲国家的需求，它所规避的问题是民族、历史和文化层面的异质性，解决这一方法的途径是建设中立的司法机构，即欧盟委员会和法院。这些部门的主要特征是由技术官僚根据其专业知识进行决策，一切决策都在后台进行，远离政客和选民。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政治和选民逐渐被引入到决策之中，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因此诞生，这代表着另外两种路径：议会化和首脑化被纳入一体化方案的备选。

不同的国家对于路径拥有不同的偏好，譬如德国支持赋予欧洲议会更多的权力以发挥自身在民主方面的特长，而法国则更青睐欧洲理事会，以此为政府首脑提供一个发挥的平台。卢克的这种划分方式超越了传统的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的二分，避免了对欧洲一体化的二元理解——反对一体化或支持一体化。超国家主义本身就包括了议会化、去政治化和首脑化，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议会化的支持者要求欧洲公民更直接的参与，与之相关的是建立一个联邦主义式的拥有欧洲民族认同的新欧洲；去政治化的支持者往是新功能主义者，他们相信中立的法律可以避开复杂政治问题所带来的冲突和效率问题；而首脑化的支持者则更倾向于由各国政府和首脑主持的合作，将超国家机构视为一种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平台。

欧盟并不是严格遵循其中某一项路径发展的，这些路径之间也绝非互斥，它在竞争中被塑形，并处于永久的演变之中。路径竞争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共同体所遭遇的危机：200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欧盟，当希腊的债务问题威胁到欧元时，欧盟不得不超越规则中原本互相不转移债务的规定，向希腊伸出援手；2013年的难民危机则考验了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部协调能力和权责分配，欧盟不得不采取难民配额制来分摊内部的矛盾，明确国家的共同责任。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欧盟经历了从“统治”到“治理”的变迁，它从一个规则和规范的制定者逐渐转变为能够参与事件政治的机构。

必须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并非是顺利且成熟的，三种路径的竞争推动了欧盟事实上的转型，但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和这些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仍需要更长时间的消化。在处理希腊债务危机事件中，暴露了欧盟缺乏处理突发危机的应急措施和配套的政治机构的问题。政府首脑为挽救货币不得不向希腊伸出援手，集体缩减开支。紧缩政策的出台具有救急的性质，以技术官僚和国家首脑为主导，缺乏与民众的沟通，因此遭至了质疑和不满；在难民危机中，隔阂不仅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产生于超国家行为体与民族国家政府之间。边境国家无力处理过境的难民，因此身居内陆的国家也受到影响。配额制看似被用以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技术官僚的非政治化手段忽视了成员国家之间的差异，保守的国家无法接受难民对本国价值观与社会习惯的冲击，同时也不能理解欧盟左派面对宗教、女性权利、种族问题等过于开放的态度。不满不仅存在于民众和欧盟之间，也存在于政府与欧盟之间。

一旦人们认为当前的决策机制无法再代表自身利益，就会开始质疑欧盟当下的路径选择。对于政府首脑来说，债务危机的背后是欧盟日益增长的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和决策效率问题，技术官僚所主导的非政治化传统有三个绕不过的矛盾，第一，统一的规范无法适配存在客观差异的成员国；第二，当成员国数量增加后，决策效率开始下滑；第三，欧盟缺乏一个与跨国家市场相适配的机构，在应对危机时无法产生了一个能及时调动资源的权力机构；对于欧洲公民来说，技术官僚的决策始终处于后台，无法照顾民众的需求，也无法照顾到多种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要求权力回归民族国家政府，以此提供更为切实的保护。在《里斯本条约》中，这些问题被重新梳理，欧洲议会的权力得到提升，决策机制得到优化，但相应的还有对日渐增长的政府间主义的批评，和仍未解决的缺乏与民众对话空间的问题 [6]。

2. 欧盟危机与保守主义复苏

如上所言，欧洲一体化的矛盾存在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政府-欧洲公民这个结构之间，欧盟内部的成员国之间存在客观的差异性，包括民主进程、历史文化和经济状况，这决定了它们对于超国家行为体的期望不同，执行决策的后果不同。而对于欧洲公民来说，他们与超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也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通过政府首脑和本国的政党。

在西班牙国内，国家政府对一体化偏好主要是由传统的两大主流政党——社会工人党（PSOE）和人民党主导。但对于西班牙民众来说，欧盟的决策与民众的反应虽然成因果关系，但他们对于政策的不满首先反馈到国家政府层面，继而才有可能到达欧盟。要理解呼声党的崛起，首先要明白其存在的根基是什么，即西班牙社会的保守主义根源；继而要明白保守主义卷土重来的原因、以及这种思潮在社会变迁中的转变；最后理解呼声党是如何利用了民众-国家政府-欧盟机构的传导机制，将人民对于欧盟政策的不满转变为对国家内部政党的反对，从而以反对党的身份扩大保守主义在政坛中的影响力。

2.1. 保守主义的根源

我们可以将呼声党定义为一个支持威权主义、反对移民和女性主义、强调民族主义的中右翼政党，它崛起的关键点源于2012年之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和领土危机，支持它的选民多倾向于国家主义的回归[7]。所以第一个关键问题由此产生：是什么导致了西班牙社会选民的右翼倾向？

根源问题在于西班牙社会的历史经验：西班牙核心民族卡斯蒂利亚的构建始于光复战争之后，伊莎贝拉二世和斐迪南的结合。天主教信徒在反抗摩尔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封建王权和宗教权威的二合一促成了中古时代西班牙王国的辉煌历史，亦为现代西班牙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但在十九世纪末，西班牙王国的现代化进程却落后于西欧各国，为了追求民族复兴，西班牙人开展了在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和回归宗教与王权的传统主义道路之间的探索。两种思想的碰撞诞生了独特的政治逻辑，以该时期西班牙著名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奥·卡尔瓦斯·德卡斯蒂亚的理论为例：他的思想综合了天主教教义、传统主义和教条主义，以上帝主义的视角看待现代政治体系。卡尔瓦斯否认社会契约论，他认为国家意志是独立于民众存在的、是上帝的产物，而非民众为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自觉让渡权力的共识。而在民族国家方面，他认为国家主权属于民族，民族意志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形而上存在，它将个体意志综合并吸收，并在一个有机体内部发展[8]。卡尔瓦斯的的思想具有威权主义的特质，他将君主制视为历史过渡时期必要的纽带，认为权力掌握在少数拥有土地生产资料的上层精英手中，他将人的自由意志解释为对民族身份和使命的觉知，一个民族只有践行上帝赐予的传统才能延续，掌握政权的精英理应传承并发扬西班牙民族的传统。

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后续的独裁者弗朗哥，当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实践受挫后，他又将西班牙民族的复兴道路重归于王权和天主教。弗朗哥的政治口号与政治目标一直是“西班牙民族的复兴”，其在1945年1月发表的题为“我们的民族革命”的演讲中就明确指出：“从光荣的传统众汲取精华，积极开展民族复兴和社会改良工作。”天主教和集权制构成了当时西班牙民族主义的骨骼，而在社会经济上，弗朗哥政府同样遵循了保护土地寡头的政策。为了与共和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滥觞相对，秩序至上、延续传统的务实性价值观充斥在教育与公共宣传中，对一代西班牙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弗朗哥的统治在七十年代结束，但这种思想并没有彻底被清除，而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被隐藏：民主化初期，西班牙社会不得不面对国家社会重组的问题，中心西班牙民族和少数拥有自治权力的民族（加利西亚、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矛盾凸显。为了尽早实现民主化，解决中央同地方的矛盾，中央政府在维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同意权力下放，给予自治区一定权力。尽管权力下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区间矛盾，但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达成妥协的前提仍然是维护国家统一：他们渴望一个强大、集权且保留天主教传统的国家。

2.2. 保守主义为何卷土重来

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被嵌合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一方面，西班牙的现代身份认同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协调，源于其“欧陆霸主”的历史经验和天主教传统中的“大一统意识”；另一方面，西班牙也有自身独特的身份锚点：天主教和君主制[9]。这两重特征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一体化进程和国家自身身份认同即可以相互协调，也存在对立的一面。

早在弗朗哥时期，西班牙的技术官僚就意识到了与欧洲建立联系的重要性。西班牙的首次正式尝试加入欧洲发生在1962年2月，当时其要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展开谈判。这个请求没有收到负面回应，而是一封亲切的回信，信中解释西班牙不能加入，因为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欧共体的领导人对建立商业关系持开放态度。于是在1970年，双方得以签署了优惠贸易协定，该协定允许开始向欧共体国家出口，阻碍西班牙进入欧洲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它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10]。

在民主化改革开启之后，西班牙的国家偏好也逐渐与一体化路径相融合：首先，西班牙的民主化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新功能主义者所提倡的“非政治化”合作是西班牙融入欧洲的首要途径，社会工人党在执政的第一个十年以当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西班牙。经济政策最初由部长米格尔·博耶（Miguel Boyer）领导，然后由卡洛斯·索尔查加（Carlos Solchaga）领导，他们将最初几年的严厉调整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和削减公共支出）与因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大量外国投资而推动的扩张周期相结合。从1985年至1991年间，西班牙的年均增长率为4.5%，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创造了200多万个新工作岗位。这个结果使福利国家的建设成为可能，社会支出从1982年占GDP的18%增加到1993年的26%。公共卫生被普遍化，医院和

健康中心在全境建立，而中学教育不再是中产阶级的特权，民主化的成果得以巩固 [11]。民主改革的成功和逐渐殷实的经济基础为西班牙扩大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基础，在这个阶段，西班牙致力于通过欧盟的平台发声，同样的，来自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交融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西班牙社会，在左翼的推动下，西班牙社会的女性权益和对弱势群体的帮扶逐渐向西欧各国看齐，自由化改革和开放国界线等政策助推西班牙进一步融入欧洲社会。

独特的历史进程导致了西班牙社会复杂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对于“独裁”的恐惧让西班牙社会暂时拥有了对极右翼政党的“免疫”，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与民主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化”就代表着“欧洲化”；但另一方，如前文所言，右翼的成分并非完全被根除，基于宗教和王权的身份锚点让西班牙较之西欧和北欧国家天然更亲近国家主义。

转折点发生在欧洲债务危机发生之后，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打破了原有左派占据上风的平衡。债务问题和难民问题暴露了欧盟的缺陷，非政治化的传统加剧了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欧盟危机的后果转嫁到民众与政府首脑之间。

紧缩政策出台后，民众首先感知到的是福利削减和社会压力，共同承担债务的决策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对于西班牙来说，这个问题要更为复杂，作为欧洲一体化内部的后发展国家，西班牙的压力并不来源于别的国家，而是本国内部。西班牙南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而较为发达的北部恰恰正是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巴斯克、加利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其中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不满情绪最为典型。在债务危机之后，整个社会的经济压力集体增加，但受限于西班牙的税制，加泰罗尼亚地区被转嫁了更大的压力。源于该地区民族主义政党的引导和与欧盟对话空间的丧失，加泰罗尼亚人民只能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这也为日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埋下隐患。

除此之外，欧盟一直致力于强调共同的责任和身份，但在政治实践中，它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平等的治理”。这个问题在难民危机中显得尤为突出。首先是技术官僚的越权：在面对难民危机时，欧洲委员会一如既往选择了非政治化的途径，他们通过法律机构宣布决策的结果——“难民配额制”，要求所有成员国履行他们的决策，但这种行为忽视了背后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与民族差异；其次是对首脑理事会的忽视，它们绕开了政府首脑，把理事会的权威弃之不顾，政府首脑被迫夹在民众与超国家行为体之间，它们既无法提出与本国利益有关的关切，也没能在第一时间向民众展现自身的权威，对于西班牙来说，埋藏在社会中的保守主义在难民多为“异教徒”身份的情况下被激发，西班牙国家的身份锚点受到挑战。

对于社会内偏向保守的民众来说，西班牙社会的身份象征与两件事息息相关，一是统一集权的国家，二是包括天主教在内的西班牙传统。在一体化初期，国家身份与“欧洲化”尚能相互协调，一方面，西班牙民主化过程在统一的前提下进行，权力下放的需求与欧盟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相相契合，另一方面，欧盟的决策与西班牙中央的决策几乎不存在严重冲突，民众得以享受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福利。但在难民危机之后，这两个核心关切都受到了冲突：第一，欧盟的危机间接导致了西班牙自治区与中央之间的矛盾，民主化初期的权力下放政策受到质疑，以加泰罗尼亚为代表的分离主义势力威胁国家统一。在这种背景下，众左翼支持的权力下放和尊重民族差异政策和中右翼面对分离主义者的暧昧态度引起了民众对于领土分裂的焦虑，他们叛逆地转向了更加保守和强硬的央地政策；第二，社会传统与欧盟所主张的多元价值观相矛盾，天主教信仰受到难民的异教背景冲击，女权、性少数群体的声量崛起又与西班牙本身男性气质的传统风气相对立，自然而然导致了人民内部基于国家身份认同间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民众不仅对内呼唤保守主义的回归，更潜移默化将“欧洲化”与西班牙国家放置在对立面。民众不仅对欧盟存在不满，也对本国妥协于欧盟决策的政治精英充满了失望和质疑。

3. 呼声党如何利用欧盟危机

当理解了西班牙社会保守主义思想抬头的原因后，关键问题随之浮现：呼声党的崛起与欧洲社会危机有何种关联？

早在二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左翼就已经将主要斗争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这一现象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潮流中就已经显现。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客观条件来尝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随着福利国家制度和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这些条件变得愈发不利，随后又因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形象及其最终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在缺乏社会主义转型可能性且与日益关注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谈判自身地位而非超越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日益隔绝的情况下，左翼整体将斗争转向文化和政治领域。

毫无疑问，进步价值观在西方社会中广泛传播，最终在与右翼保守传统价值观的对抗中占据主导地位，后者则逐渐被边缘化。直到二十一世纪，欧盟一体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促进不同文化大规模迁移，难民危机和经济衰退加剧了潜藏在各个身份群体之中的文化冲突，传统主义和极

端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对抗进步价值观的关键力量。而2017年之后西班牙社会存在的领土危机恰好给予了呼声党将极端民族主义主张与社会焦虑结合起来的契机。

3.1. 迎合领土危机下普遍焦虑，以民族主义旗帜维护国家统一

呼声党的原始定位是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它的主张基本延续了弗朗哥时期“西班牙和反对西班牙者”二元对立的思想，坚信国家权力属于一元的西班牙民族，一个强大且集权的政府是民族国家延续下去的保障。在民主化改革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弗朗哥时期的阴影，民族主义的声音一直被对于独裁政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恐惧所压制，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并且在欧洲一体化作为当时主流思想的背景下，这种思想始终只被极少数群体所认同。

民主化改革之后，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基本被中右翼的人民党所吸纳，他们去掉了激进主义的部分，但仍保留了传统主义的特征：强调西班牙国家政权与民族主权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强调西班牙社会的单一性，排斥外来移民，反对国家分裂。但由于马里亚诺·拉霍伊在面对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时的软弱，部分激进的国家主义者独立了出来，成立了呼声党，在他们的纲领里，首先致力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势力，主张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取缔破坏国家统一的政党和协会，回归彻底的单一制。

呼声党崛起的第一个契机是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民族主义领导者普伊格蒙特的带领下，加泰罗尼亚地区爆发了动乱，事发之后，普伊格蒙特开始在欧洲其他国家流亡，并持续鼓动西班牙国内的分离主义运动。如前文所言，加泰罗尼亚的动荡与欧盟的共同债务决策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激化了民众对于国家主权的诉求。2018年，德国的法院判定普伊格蒙特并不负有“叛国罪”，并将其释放。对于西班牙人来说，这个判决由一个亲欧派主导的国家机构裁定，并获得了欧盟司法委员会官员的认可，无疑体现了技术官僚对于西班牙法律的挑衅[12]。除此之外，加泰罗尼亚问题同样与欧盟在地区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有关，科索沃地区的独立经历了仅仅只存在于名义上的全民公决，但出于政治原因，欧盟不得不同意它的独立[13]，这就为法律造成了一种支持分离主义的隐患：联邦化的欧盟制度使得加泰罗尼亚存在越过西班牙与欧盟直接接触的可能，这严重威胁了西班牙的主权完整，这种焦虑恰好与呼声党的政治主张相契合，在对欧盟机构失望后，这些民众将期望转向了中央政府，期望它可以运用更加强硬的政治手段来维护国家统一，这种诉求经过政党的加工，就变成了对于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向往。

在此背景下，呼声党得以依靠突出关键议题，并围绕该议题开展更为多元的宣传活动来达到吸引选民的目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针对独立派领导人普伊格蒙特等人的审判，呼声党以民间检察官身份参与其中，其一位主要领导人代表该党出席了庭审。尽管他们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塑造了该党坚定捍卫国家稳定的西班牙民族主义形象，并高举这一旗帜。

3.2. 维护传统，强调“西班牙民族”身份认同

除此之外，难民浪潮中欧盟“非政治化”的决议同样使得民众之间的对立激化，给予了呼声党发展自身的机会。一方面，政府首脑在决策中的缺位使得技术管理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呼声党得以使用二元的话语，将矛头对准了“精英”阶层，强调自身代表了“西班牙民族”；另一方面，面对文化背景各异的少数民族难民，保守主义者产生了自身传统与宗教信仰的危机感，呼声党适时的呼唤保护传统节日、遵循宗教传统，以此获得了这部分民众的支持。

这解释了呼声党的疑欧主义特质从何而来——尽管欧盟多年来一直将联邦化作为它的目标，但“欧洲公民”的身份认同并没能取代原本的民族国家认同，目前的欧盟依然处在从非政治化向议会化的过渡过程中，于是这个话语空间的缺位反而被保守主义所占据。在实际的加泰罗尼亚问题中，欧盟的存在非但没能阻止分离主义，反而因为在政治与法律之间的摇摆为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提供了一种依靠公决达成独立的可能，对于普伊格蒙特的判决更加加剧了人们对于“亲欧派”的怀疑。除此之外，当欧盟为了解决难民问题而宣扬多元主义价值观时，或多或少侵害到了西班牙的国家认同。这些不满恰巧与呼声党主张的国家至上、西班牙民族至上相契合，后者成功利用了民众与欧盟间的分歧，通过将欧盟与西班牙民族的对立化来强调自身的代表性。

呼声党的主要攻击对象是移民和进步主义者。一方面，他们发起针对移民的排外运动，如针对非政府组织“Proactiva Open Arms”的运动和指控，该组织使用“Open Arms”号船只在地中海营救处于危险中的移民；反对无人陪伴外国未成年人收容中心的运动，试图通过将他们称为“未成年人狼群”来妖魔化该运动；2019年11月，多家社会组织因该党在当月选举活动中使用的视频涉嫌煽动仇恨，向检察机关举报Vox，甚至由Vox支持的安达卢西亚政府也于2020年1月发起了一场针对该党传播种族主义谣言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呼声党则持续针对女权及LGBTQ群体，反对捍卫平等权利的政治和制度共识，在马德里市政厅，该党成功破坏了持续14年的年度反性别暴力机构声明，旨在废除《性别暴力法》和性少数群体平等法律。

3.3. 拆解福利国家，探寻新的一体化方案

欧盟“非政治化”传统加剧了民众与技术官僚之间的不信任，特别是在新的技术革命前提下，信息不再被精英所垄断，一些旧有的技术权威被瓦解，在大多数民众眼里，欧盟的精英不一定比互联网上的知识型博客更可信，后者与民众之间天然拥有情感上的优势。这种代表性危机同样出现在传统政党与民众之间，传统政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并没能解决来自欧盟的“烂摊子”，也没能阻止技术官僚的决策，而呼声党正是利用了这个契机，通过媒体和互联网进行一种新型的、具有民粹主义特质的政治动员，突破了传统政党的垄断，也成功利用了选民的情感因素，成功煽动了对于现存体制的不满。

呼声党的经济和社会方案主要针对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中遭遇“被剥夺感”的中上层收入群体，一方面，它的提案旨在缩小国家职能，精简官僚机构，特别是废除自治区，使官僚体制更符合单一制，并降低税率，土地自由化，养老体系市场化；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保护主义特质，例如提倡雇佣西班牙本国工人、实现西班牙能源自给自足等。

除此之外，呼声党还提出了一种新的欧盟设想，旨在将西班牙人和西班牙的利益置于超国家组织和跨国公司之上；维护国家边界和国家主权；减少欧洲公共支出，以双边关系取代超国家机构。

呼声党的主张得以受到民众支持，其关键在于抓住了欧盟机构中的反对派缺席的潜在矛盾。欧洲一体化初期，邦联主义因无法构建一个欧洲民族的身份认同而失败，联邦主义也因为否决权问题失败，只有新功能主义者通过探索取得了成功，这种去政治化的制度构建没能给反对者提供话语空间，欧盟倾向于将决策过程优先放置在后台，其次才是考虑首脑会议。至于欧洲议会，尽管它的权力得到了提升，但在庞大的基数下，许多次级的社会问题依然缺少声量，欧洲议会的政党联盟大多包含多个国家的政党，因此他们在投票和决策的过程中只能优先处理更具有共性的问题，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国家社会内部的差异因此被忽略了。因此当民众对欧盟决策产生不满时，他们的诉求并不能及时传递到决策层内部，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远比上升到超国家行为体层面更好解决，这种情况降低了民众对于欧盟机构的认可，也加重了与国家层面政治精英的矛盾。当传统政党温和的提议不再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和代表性时，民众自然而然就会转向声音更尖锐、主张更鲜明的新政党。

4. 结论

西班牙呼声党（VOX）的崛起是欧洲一体化矛盾在超国家行为体-政府-民众之间传导的结果。作为极右翼政党，呼声党通过宣扬民族主义、疑欧主义和保守价值观，成功利用了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危机、难民问题以及欧盟治理缺陷所引发的民众不满，从而在西班牙政坛占据一席之地。

从欧洲一体化的视角来看，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时暴露出的治理困境——如技术官僚主导的“非政治化”决策、成员国间的不平等、缺乏民主合法性等——加剧了西班牙国内的政治极化。欧盟的紧缩政策和难民配额制不仅削弱了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信任，也激发了西班牙社会对天主教传统和国家认同的捍卫需求。呼声党借此机会，通过民粹主义动员和社交媒体传播，成功塑造了“反建制”“反欧盟”“捍卫西班牙民族利益”的政治形象，从而在选举中取得突破。

然而，呼声党的崛起并非是弗朗哥主义的回归，呼声党自身也并非绝对的疑欧主义政党，而是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背景下，西班牙社会对身份认同、主权危机和民主代表性问题的应激反应。呼声党从未公开表示过要脱离欧盟，它的领袖对于欧盟的评价是“欧盟侮辱了西班牙和正义，它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改革，以便不再成为政变策划者和恐怖分子的避难所。西班牙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抵挡如此多的侵权行为。对德国，他们绝对不敢这样做。”^[14]它的成功反映了欧盟内部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的张力，以及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的失望，当“非政治化”独木难支时，“首脑化”和“议会化”的主张就会随之补上，真正的诉求依然是追求更加完善的一体化机制。未来，欧盟若无法有效解决民主赤字、成员国间不平等及社会价值观冲突等问题，类似的极右翼势力可能在其他国家继续抬头。因此，研究呼声党的崛起不仅有助于理解西班牙政治的变化，也为分析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提供了重要案例。

参考文献

- [1] SANTIAGO C, GUSTAVO, S.(2004).En defensa de España: Razones para el patriotismo español.
- [2] 邓曙, 尹建. 弗朗哥时代的阴影——西班牙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呼声党 [J]. 国际研究 参考, 2021(1): 16-23.
- [3] КАРАМАН К В. Євроєвроскептицизм у програмних засадах іспанської праворадикальної партії Vox («Голос») [J]. Серія: Історія. Політологія, 2023 (35-36): 155-162.
- [4] MIGUEL URBÁN, “La emergencia de Vox”, Vientosur, Octubre 2019, p.89.

- [5] LUUK, M., *Alarums and Excursions*. Agenda Publishing, 2019, p.23.
- [6] □埃尔·维考特伦, 王程乐.从《□斯本条约》考察欧盟“统治-治理”现状 [J].德国研究, 2012, 27(2): 42-53+125-126.
- [7] RAMIS-MOYANO R, PASADAS-DEL-AMO S, FONT J (2023) “Not only a territorial matter: The electoral surge of VOX and the anti-libertarian reaction,” *PLoS ONE* 18(4): e0283852, 202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83852>
- [8] MELLÓN, J.A. (2019).“La idea de España del liberal-conservadurismo español De Cánovas a Aznar,”*El reinado de Juan Carlos I (1975-2014): actas V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Historia de Nuestro Tiempo* / coord. por Carlos Navajas Zubeldia, Diego Iturriaga Barco, ISBN 978-84-09-08943-7, 2019, 81-94.
- [9] RODRIGO RICARDO, “La España Democrática (1982-2023): De la Integración Europea a los Nuevos Desafíos,”*Estudiando*, 5 abril 2025 , <https://estudiando.com/la-espana-democratica-1982-2023-de-la-integracion-europe-a-a-los-nuevos-desafios/>, last accessed on 15 July 2025 .
- [10] CARMEN RENGEL, “40 años de España en la UE: cuando el anhelo de libertad superó a la economía,”*Huffpost*, 14 June 2025 , <https://www.huffingtonpost.es/politica/40nos-espana-ue-anhelo-libertad-supero-economia.html>, last accessed on 15 July 2025 .
- [11] Navarra confidencial, “ El catalanismo, un motivo de euroescepticismo más, ” *Navarra Confidencial*, 16 April 2018, <https://www.navarraconfidencial.com/opinion/el-catalanismo-un-motivo-de-euroescepticismo-mas/>, last accessed on 15 July 2025 .
- [12] Navarra confidencial, “ El catalanismo, un motivo de euroescepticismo más.”
- [13] MAKARYCHEVA A.V. La postura de la Unión Europea frente al separatismo en Cataluña. *Cuadernos Iberoamericanos*. 2020; 8(2): 65-75. (In Russ.) <https://doi.org/10.46272/2409-3416-2020-8-2-65-75>
- [14] MARINA ALÍAS, “ ‘Spexit’: el euroescepticismo de Vox sale del armario, ” *Vozpopuli*, 16 April 2018, https://www.vozpopuli.com/espana/politica/spexit-consagracion-euroescepticismovox_0_1311169908.html, last accessed on 15 July 2025 .